

中华学人丛书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家与史学

◎ 赵庆云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家与史学

◎ 赵庆云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赵庆云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4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4624-3

I. ①2… II. ①赵… III. ①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20 世纪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3699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7654738 5765473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 <http://xueda.bnup.com>

ERSHISHIJI ZHONGGUO MAKESIZHUYI SHIJIA YU SHIXUE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12-3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3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8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曹欣欣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段立超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7654750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7654738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7654758

目 录

上篇 史家个案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3
范文澜早期的近代史研究	22
范文澜续写、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构想及实践	36
胡绳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50
一、早年近代史著述	51
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之成书及反响	57
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撰著及反响	79
四、对“革命叙事”之调适	89
刘大年的史学研究	98
一、《美国侵华史》的撰写及论争	98
二、构建近代史学科体系	110
三、晚年近代史论述	117
荣孟源潜心筑础	123
一、史学研究 with 理论建树	123
二、整理编纂近代史资料之努力	133
“旧史家”与近代史研究	141
一、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	142
二、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150

中篇 理论探讨

“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169
一、“三次革命高潮”之提出	169
二、“三次革命高潮”之取向	174
三、“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	186
四、“三次革命高潮”之阐释弹性	191
何为“近代”	195
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	223
一、李书概述	225
二、关于“学科化”问题	229
三、史学与政治	234
四、“革命叙事”的内在张力	239
五、结语	248
“历史创造者”问题再审视	251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述评	260
一、唯物史观及社会形态问题	260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之争	267
三、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与批评	271
四、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研究之影响	275
五、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279
六、公众历史学与大众化问题	284
七、数字技术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287

下篇 学术组织与活动

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293
一、四次盛会之概况	294
二、会议主题之评析	299

三、理论、方法之嬗变	303
四、余论	313
井上清 1960 年来华访学始末	315
《台湾历史概述》成书过程	328
《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风波	339
从几则未刊资料解读黎澍	348
一、黎澍与沈元	348
二、所谓“历史问题”	351
三、一封辞职信	355
张国淦《中国方志考》的整理出版	360
后 记	370

上篇 史家个案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范文澜(1893—196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宗师”。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规模宏伟，风格独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无须讳言，范文澜的通史叙事有鲜明的时代印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其地位不可抹杀。

一

范文澜，初字芸台，改字仲沅，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北大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章太炎门生、著名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和陈汉章，攻读中国文学、文字学、语言学。毕业前还就教于经学名家刘师培。他当时的志趣是“追踪乾嘉”“笃守师法”，以专精训诂考据为己任。1917年夏毕业后，他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为私人秘书。是年11月离开北大，先后在沈阳、汲县、上海等地工作。如蔡美彪先生所言：“他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在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并且是公认的高才生。”^①1922年9月，范氏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赴南开中学任国

^① 蔡美彪：《旧国学传人——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见《学林旧事》，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包括《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和国学要略。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其《文心雕龙讲疏》，得到学界名流梁启超的赞赏，梁氏为此书作序曰：“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①此书出版后很快受到学界重视，范氏也自此崭露头角，赢得了学术声誉。大约在1926年下半年，范文澜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朴社”^②，并出版《诸子略义》《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著作。这些著作常引录北大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先生的讲论，继承北大国学传统，范氏可谓“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③。

早在1925年，范文澜已然逐渐开始由书斋学者向“左”倾革命者的转变。^④他走上街头，投身五卅反帝游行，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1926年他开始阅读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5月天津警察当局派人拘捕范文澜，他得张伯苓协助避走北平。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范氏随即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组织。1930年9月以“共党嫌疑”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由蔡元培和其他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两

① 梁启超：《〈文心雕龙讲疏〉序》，见《范文澜全集》，第3卷，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 此据叶毅均之说，参见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另有《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认为范氏1925年入朴社，《顾颉刚年谱》（1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则记范氏1927年入朴社。

③ 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见《学林旧事》，19页。

④ 对于范文澜的思想转变，叶毅均有较深入的探讨。详参叶毅均：《为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学术思想前传》，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7。

周后获释。1932年范氏受聘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次年出任院长。他的住所成为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点。1934年8月，范氏再次以“共党嫌疑”被逮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拘押。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出面交涉，由北大及北平各大学教授24人联名保释，1935年1月范氏出狱。^①此后，他的“学风与文风为之一变”。1936年出版《大丈夫》一书，描述历史上25位民族英雄的壮烈事迹，激励民族精神。此书的出版“在范文澜的著作生涯中是一个转折”，“为尔后《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开拓了先路”。^②

1936年8月，范文澜赴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并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③他辗转活动于嵯峨山、竹沟、信阳等地，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④。在此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夜间伏在小灯下读《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⑤。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至延安。1939年11月，范文澜携带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亲笔信，自河南奔赴解放区政治中心延安。几经周折，他于1940年2月到达延安^⑥，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其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全党整风，毛泽东号召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即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以满足

① 参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4~355页。

② 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见《学林旧事》，27页。

③ 参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6~357页。

④ 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见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10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⑤ 王兰西：《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转引自《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9页。

⑥ 参见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见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104页。另有《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60页）所记范文澜至延安时间为1940年1月。

干部学习之需。当时党内史学家不乏其人，为何此前主要从事经学、古典文学研究的范文澜被毛泽东看中而委以撰写通史之重任？这或许与范氏身兼“新”“旧”不无关系，他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对新学的精到领会，并在实践中服膺马克思主义。如齐思和所言：“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适合的了。”^①也有学者指出，范文澜之通史撰著，得力于其早年的经学训练甚多。^②此外，范文澜与毛泽东在精神气质层面的契合也不可忽视。许冠三认为：“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亦如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③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着力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澜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积极践行者。

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人着手编撰，具体分工为：范文澜负责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负责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负责第三编。这种集体合作并非易事，领衔者需要具备相当的资历和权威。范氏此时虽然已在主流学界有一定声望，但毕竟到延安未久，历史研究室资历较老的杨绍萱、谢华就拒绝参与。关于撰写过程，各人回忆略有出入。叶蠖生回忆：“在不长的时间内，大家都陆续交出了初稿。但因为事先并未讨论出写作大纲，各人的作品不仅文风各异，而且处理历史的观点也各有己见，要加以统一相当困难，这使范老很为难。只有金灿然一人，严格按照范老要求，只作材料札记，不作条理论述，范老认为这对他还有点帮助。既然无力统一初稿，范老就决心由他个人独力编写。”^④佟冬的回忆则是：“大家编出资料长编后，交给范文澜同志统一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

② 参见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载《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44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④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见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71~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修订。资料越搜集越多，书的分量越写越大。”^①自叶、佟二人的回忆来看，范文澜最初的设想是仿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做法，让其他人仅作资料长编，而由他来统一撰写。但实际上除金灿然外，其余各人并不止于编纂资料，而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此即范氏所言：“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②可见此次分工协作、集体撰著的尝试并不太成功。

范文澜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撰成约60万字的书稿，1941年5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1942年出版中册。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10年间先后有8种版本刊布。^③此书出版时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立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④

《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国通史的典范之作，自出版时起便广受瞩目，1949年以后更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扛鼎作之一。但《中国通史简编》撰著于革命战争时期，延安资料匮乏；且以全新的视角、观点来撰通史，缺乏既有专题研究成果的凭借，只能自辟蹊径；加以不到两年时间仓促撰成，难免因陋就简。进入北京后研究资料条件大为改善，范文澜作为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对于撰写中国通史期许颇高，对《中国通史简编》自然不能满意。1951年，范文澜在中宣部机关所做讲演中对《中国通史简编》做了措辞颇为激烈的自我检讨。笔者得见其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手稿两种。一是原拟题目为《反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的手稿，后改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后改为《割裂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二是题为《关于〈中国

① 佟冬：《我的历史》，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8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载《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③ 参见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④ 蔡美彪：《学林旧事》，29页。

通史简编》的检讨》的手稿。范文澜的自我批评过于严苛，将《中国通史简编》说得几乎一无是处。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看过《〈中国通史简编〉自我检讨》的列印稿后给范回信曰：“文澜同志：你的文章，略有修改……我想，如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的‘光明面’也提出一些，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①此讲演记录后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为题发表于《新建设》1951年第2期。范氏着重检讨了两个方面：一曰“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曰“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②范文澜同时向学界广泛征求意见。笔者从有关文献中曾得见夏鼐、郭宝钧、安志敏等考古学家对《中国通史简编》中涉及考古的内容所提意见之手稿，其中夏的意见3页，郭3页，安13页。唐长孺在1950年对《中国通史简编》做了细致校读，手稿《〈中国通史简编〉校记》达160页，所提意见颇为具体细致。^③于此可见，范文澜对于通史写作乐于听取学界意见，孜孜以求其学术的完善。

范文澜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后实际上为重写)作为首要工作全力投入。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机构，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以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之修订。^④他自己也无疑将工作重心放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上。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所内同人“深入钻研”，要为“古代史、少数民族史、世界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做准备^⑤，体现出他的宏大眼光和精到见解，即将中国历史放在古今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去观察和研究。这一构想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过，近代史所的通史组一直以来研究力量颇强。在1958年的

① 据泰和嘉成2013年5月拍卖的《范文澜手稿十六种》，笔者曾应邀看过此手稿原件。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载《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③ 据泰和嘉成2013年5月拍卖的《范文澜手稿十六种》。

④ 最初5人，分上古、中古、明清3个小组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通史组”，人员有所增加。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况》，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4期。

⑤ 李瑚：《李瑚日记》，1952年9月，未刊手稿，藏李瑚家。

“史学革命”中，范文澜强调“厚今薄古”的研究导向，在近代史所内部，也曾有人指责范文澜潜心撰写中国通史是“关起门来写书”，不能为当时的政治服务。^①

范文澜为撰写通史倾注全部心力。中科院建院之初，中宣部曾提名范氏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执意辞谢不就。^② 1953年11月15日，范氏致函吕振羽，表示中科院琐事太多，“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没有正式做过工作，我心里急躁得很，长此下去，我将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这样，我将死不瞑目”，并表示，如果中科院不能给予他充分的工作时间写书，就“决心离开科学院”而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他同时向吕提出了要求：“（一）除了参加党的会议及学习会有关学术的座谈会，其余的事，一概免予参加。（二）上面号召的大运动，给我尽先自我检讨的机会，我检讨完了并保证决心改正以后，即许我回去工作。（三）不担任任何学校职务，给一教员名目，使我能工作。（四）给我两三位助手，帮助我工作。我如能从北京带去几位，当然更好，不必再抽调您校的干部了。（五）必要的参考书，希望领导上批准购买。（六）给我夫妇二人生活费，最高不超过一个教授的工资。（七）不到校外去讲演，校内讲演最好也没有。允许我有推辞之权。”^③ 1959年后，他患心脏病，医生劝他休息，他却感到时不我待，坚持带病工作。^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不得不中断。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传话，表达对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的支持。范氏非常兴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⑤ 他为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惜乎天不假年，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书

① 《整风补课群众意见之三》，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② 参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313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④ 参见蔡美彪：《〈中国通史〉的编写情况和体会》，载《中学历史》1985年第5期。

⑤ 参见蔡美彪：《回忆范老论学四则》，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实际上并非简单“修订”,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并非范文澜首创。郭沫若曾率先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史论战中也产生了一些专论,但多因缺乏历史材料的搜集与论证而失于空洞。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贯彻到整个中国通史的书写之中。其在理论观点上确实“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①,同时亦通过丰富的史实说明了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②。将范著通史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论著代表,应该当之无愧。

立场、观点鲜明,背后贯穿着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是范著通史的一大特点。延安时期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然体现出前后一贯、逻辑自洽的系统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中国通史简编》颇为重视经济史,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论述大的政治形势及思想文化变动时,亦往往着眼于寻绎经济因素,从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加以说明。据

^① 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佟冬:《我的历史》,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84页。

范文澜自己的总结,《中国通史简编》与“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以下四点。其一,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其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阶段。以社会形态理论划分历史分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特色,中国史学界围绕这一分期方式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论争。范文澜是“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1940年年初即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明确提出赞同“西周是封建社会”,并予以详细论证。《中国通史简编》即以西周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始,并将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从西周起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其三,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其四,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① 这几点确为《中国通史简编》的特色所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阶级观点”。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纳入对立—冲突、矛盾—斗争的模式,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皆为阶级观点的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的论述中,不仅朝代更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王莽、王安石变法是为调和阶级矛盾,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从阶级斗争中寻求解答。

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以“阶级观点”为核心,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立场来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大力论述农民起义及其政权的正面意义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打破王朝体系和帝王将相中心的书写,对于以往的传统历史书写无疑具有相当强的冲击甚至颠覆意味。范文澜的北大同门金毓黻曾批评《中国通史简编》曰:“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②《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后,因其影响力的扩散,国民党方面颇为恼怒,对《中国通史简编》更予以严禁。1942年2月9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

^① 参见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586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